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逻辑机理

盛映崑, 苏国辉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彰显时代课题与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提供新动能,使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实践相互滋养、相互促进,从而更好地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实践;中国化;逻辑机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价值基础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2-0016-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2.002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Marxism Taking Root in China

Sheng Yiwei, Su Guohui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why Marxism has taken root in China are that it has become a scientific guid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achieve great rejuvenation, that it has inherent unity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pplying Marxism has made historic an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and that its developing by the CPC has always highlighted the age subjects,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national temperament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also provided new impetus for the theory of Marxism itself to retain its own vigor and vitality.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nourishment and promo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practice, Marxism has better rooted, bloomed and fruited in China.

Key words: Marx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actice in China; sinicization; logical mechanism;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value basis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我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收稿日期:2022-1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DJ050);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JGY2022123);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22YCXS212)

作者简介:盛映崑(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苏国辉(1974—),男,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们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列国欺压、民不聊生的境遇下,各种政治力量依次登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均以失败告终。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掀开了中国革命史册的崭新一页,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最有效的治病良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牢牢扎根在中华大地上,使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于此,探究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原因和历史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普遍真理,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由人来推动的,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又具有客观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这里的经济社会形态不是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社会形态,而是指社会生产方式与人民主体意志相互作用进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虽然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但社会历史的发展并非仅由生产力决定。“‘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在这里,马克思揭示社会

历史发展的规律时引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晚年曾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系统阐释。“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恩格斯把经济社会中每个人的意志看作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分力,而社会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推动的。由此可见,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实践过程中蕴含着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而处于危亡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华大地上每一个具有爱国情感的中国人苦苦追寻的问题。近代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社会”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丧失了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段耻辱的历史;“半封建社会”打碎了原有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产生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最深刻、最根本、最激烈的矛盾,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一经成立就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历史使命,带领全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顽强斗争,爆发出无限的抗争精神,这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也是革命阶级战胜反动阶级、先进力量战胜落后势力的必然结果,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道路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璀璨夺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四运动唤醒了民主与科学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外敌入侵,面临民族危亡,党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改变自身悲惨境遇而寻求出路。就在此时,马克思主义犹如黑暗中的一缕阳光,给处于绝境的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历史任务,继而全面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历史任务——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政治和制度基础。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解决国内新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成为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一大步。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尽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充满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三)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5]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了可供实践的方法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的现实原因。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创新性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具体国情作出判断和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创新发展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典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最大程度地整合和团结中国社会的各方革命力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再次运用此方法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

指出制约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矛盾就是生产力,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狠抓经济建设,大胆引资、引技、引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矛盾体系的整体性认识决定着对动力体系整体性认识,新发展理念就是在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矛盾体系基础上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6]。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只有坚持学懂弄通其内在机理,才能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7]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实践观、价值观、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识,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扎根、发展、壮大,绝不是偶然现象,必定是和该国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有着深层次的逻辑联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民族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中国扎根的文化底层逻辑。

(一)“实事求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认识论基础

在绵延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内核贯穿文化血脉,串联精神节点。“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班固的《汉书》,其中赞美西汉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8]。《易经》中也讲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9]这里提到了一个主客观统一的辩证法则,即“求是”的方法论。“实事求是”的思想最终集大成于儒家文化,儒家学派分别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里就体现了孔子强调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儒家思想作为中化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但其思想内核却是实事求是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生动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一切统一于物质,同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并通向真理的桥梁,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尺度。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P135-136)}他强调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是具体实在的,是“实事性存在”。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0](P134)}他指明了“求是”思维的方法途径,即可以借助实践工具,以求得主客观一致的真理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认

识论基础上具有一致性,虽然二者在异时空各自发展,但发展内核的一致性使得二者殊途同归:外在完美统合、内在无缝契合。

(二)“事在人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实践论基础

“事在人为耳,彼朽骨者何知”出自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六十九回。其中的“事在人为”就是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事情能否成功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程度,这与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以及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和行为截然相反,这一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根本作用。而发扬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自古就具有主动精神,从神农尝百草到大禹治水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古人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的发明及应用,使人类文明迎来第二次大爆发,这些发明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世界的再突围和再创造,彰显出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进取精神。在思想上,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对封建社会阶层人为设定的质疑和反抗。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在其《悟真·绝句六十四首》写着“我命由我不由天”,同样表现出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命运自我主动掌控的诉求。而柳宗元更是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高度概括为“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柳宗元《愈膏肓疾赋》),这些都集中表达了事情成败主要是事在人为而不能听天由命的观点。“事在人为”的思想内核贯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和实践中,是支撑起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架构和脊梁。

马克思主义同样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

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P133)}这里对机械唯物主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予以批驳,同时他还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0](P134)}马克思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引申为自由,认为自由是人类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认识和改造。所以,自由与人的认知力与改造力正相关,人在认知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提升自身,实现“人化自然”和“自然化人”的双向互动。人既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人的主体意识和反思能力,又在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人的真正需要,从而实现人的现实的生存与发展^[11]。

正是“事在人为”彰显的主体性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基础,使二者可以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进而可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引。

(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论基础

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来看,人类很难成为道德圣人^[12],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建设为人类社会发展奠定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北宋诗人范仲淹在其《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体现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强调个人要把祖国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幸福安康放在首位,表达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远大的理想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晋代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中将“大同社会”描述为没有剥削压迫、人们生活安乐、社会一片祥和的中国式“乌托邦”。而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耕者有其田”的思

想强调满足农民阶级对获取土地这一生产资料需要的制度性初探,使大同思想向实际迈出了一大步。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其从政治制度和分配制度上对大同社会思想进行了完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在批判西方现有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从西方极端利己主义文化根基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撕裂的社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的个人劳动必定是对抗的、孤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受自然限制而形成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导致异化劳动的产生。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0](P165)}在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中“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意愿从事感兴趣的劳动,在这种状态下,集体利益已经不再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而成为异己的利益,而是和个人利益高度融合的利益,人们高度自由自觉地为集体利益而劳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论基础。共同的价值指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导向作用、凝聚作用、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马克思主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锐利武器。

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辉煌成就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进而继续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跨过一道道艰难险阻,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一)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人民民主是打开现代化大门的关键密钥。近代中国社会,人民久居低位、久被压迫、久被束缚,创造力被严重压制,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通向光明的道路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迈进,坚持赋权于民,充分发扬最广泛最真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从而真正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坦途。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一历史性变革是中国政治思想基础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彻底打碎了以封建“家长制”“宗族制”为核心的制度基础,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民真正成为权利的所有者、财富的享有者,从而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从小农心理架构、价值追求向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跃迁,是从封建传统文化的“儒释道”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显著特征,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新时代实现再跨越和新发展,在充分保障人民民主真正得到最大限度实现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创造性实践和开创性拓展。

(二)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但“赶考”之路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建国初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国内发展状况总结为“一穷二白”,即工农业不发达、人民文化科学素养亟待提高。经过多年战乱建立起的

新中国,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封锁,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百炼成钢,百折不挠,面对各种挑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坚定信念,鼓足干劲,奋勇拼搏。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良好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就;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倡导“和平共处”外交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国际外部环境。促使中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的又一大发展、大跨越,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的契合性,以及中国共产党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

(三)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民生等各方面均取得突破式进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大会重新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科学分析国内发展主要矛盾并对症下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发挥农村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同时注重激发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一重大制度改革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和温饱问题,在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改革开放以来,借

着全球化的东风,中国的发展迎来腾飞的黄金阶段。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再到建设出口加工区,改革开放进程呈梯度逐步开放、层层深入态势,构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率先发展”重要战略的支撑点,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中国已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的战略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3]

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科学谋划、真抓实干、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重大突破、5G技术领先全球、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得到广泛认可等等,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中的光辉历程,也昭示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正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四、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聚焦探索时代课题与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不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提供新动能,使其

不断勃发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光辉未来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进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围绕重大时代课题而展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围绕重大时代课题而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内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发展,并以此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从而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向、阶段、任务、动力、战略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新的主要矛盾、新的目标任务,呼唤新的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锐意进取,紧紧围绕新时代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的历史阶段,谱写了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始终努力探索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发展道路,最终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而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条革命道路不同于苏联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

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4]可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人类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也是对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深层逻辑是源于其思想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其现实逻辑是源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实践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又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实践相互滋养、相互促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提供新动能,将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更好地生根、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5] 习近平.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 人民日报,2015-01-25.

[6] 蒋显荣,侯彭振. 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动力认识的原创性贡献[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46-54.

[7]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J]. 求知,2022(12):4-11.

[8] [东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839.

[9] 曾凡朝,校注. 崇文国学普及文库周易[M]. 武汉:长江出版社,2020:11.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张晓红,谢震. 自我意识的历史嬗变与多维解析[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45-54.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4.

[13] 余天放. 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路向:基于道德判断问题的分析[J]. 中州学刊,2022(5):87-95.

[14]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5-19.